

汉字的反向性中蕴含着华夏文明传承密码

◎ 陈藩庚

摘要：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语言符号，是具有形体美与灵魂美的文化生命体。本文则着重阐述汉字的灵魂美，从剖析笔画结构中所蕴含的儒、道、法与阴阳家等哲思，认识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含有字德的文字。指出汉字的形体美与灵魂美、汉字在世界文字进程中反向性发展的活力美与固执美，是构成汉字强大的传承基因，是华夏文明五千年薪火不灭的重要密码。

关键词：汉字 反向 哲思 发展 密码

汉字在形、音、义之外，还是一个有国籍的生命。生命是指具有感觉、有知性、有繁衍能力的物体。每一个汉字都有形象被感觉，都有内涵被感知，汉字还有强盛的繁衍力，它的族员从秦小篆时的一万多字，扩张到现在的五万六千多字（尽管都是“人工繁殖”）。所以，从文化意义上说，汉字具备有生命（文化生命）的条件。

我们每天都在运用汉字进行信息沟通，有没有想过汉字的生命来自笔画结构？有没有想过笔画结构既是字形的骨肉还蕴含着字德与哲思？有没有想过我们怎样书写才是尊重这些精灵？有没有想过这些精灵每天都在潜移默化着我们的灵魂？有没有想过它们正通过我们每一个使用者传承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这些思考都是产生本文的背景。希望相关的探索，可以抛砖引玉，填补汉字研究乃至国学研究的空白，并开阔文化传承的视野。

一、汉字的反向性结构蕴含着先人哲思的密码

汉字反向结构的对称与均衡意识，除了在匡正汉字字块、统一笔画线状与运笔顺序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外，还蕴含着祖先多种哲思的密码。

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鼎盛，百家争鸣，其中以儒、道、法和阴阳五行学造诣最高。鲁国推崇儒学；齐地注重儒学、道学和阴阳五行学；楚地盛行道学与辞赋；秦地与三晋聚集法家与游说之士。作为传播文化载体的汉字，其字根及主要用字多出自这一时期。据《战国文字编》所录^①，战国时期被视为正字的18288个古文字中，已出现今天作为部首的所有字根及主要用字。其时的造字者，在字形的建构中，是否反映出先秦的文化态势？是否传递出当时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否融入了儒、道、法和阴阳五行学的哲思？从小篆中，我们得到一份肯定的答案——儒、道、法和阴阳五行学在汉字中都有着深刻的体现。这一时期的汉字是集当时文化精华的重要符号，它不但能以句、段、篇的群性组合书写当时的文明，而且在单位字形内，也能展示出先人的哲思。

秦统一天下,独尊法家,以暴力焚书坑儒,废除儒、道、阴阳五行等诸家文化,并授命法家中坚、时任丞相的李斯整治文字。但秦代法家在整治文字、推行小篆时,竟然在文字中保留了儒、道和阴阳五行学等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不是自扇耳光,不是讽刺,而是个智慧,是个值得探究深思的课题。

究竟小篆中蕴含着儒、道、法和阴阳诸家的哪些智慧?融合了哪些文化价值?

(一) 汉字的反向性结构折射出儒家、道家的核心价值

儒学的核心是“中庸之道”。《论语·庸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视为高尚品德。“中”是标准,是目的;“庸”是态度,是方法。《中庸》视“中”为权重,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进一步指出“中”是天下事物的根本,是天道。古人认为天道不可违,人要顺应天道。而要顺应天道,必须以“和”为天下共行的大道。在这里“和”是“庸”的延伸演绎,是达致目标的途径。以“和”去达致目标,需要人的经营,这是人道。通过“和”这样的人道,可以致“中”,达到“与天地参”,即与大自然融合,也就是后来儒家所说“天人合一”的圆满境界。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得更明确:“中,上下通”“庸,用也”。这里的“上”指天,“下”指地,亦指人;“用”,就是适用,可行的路径。“和”的目标宏大,不仅要与天地“和”,还要与左右“和”。“中庸”就是找到持久适当的良方,使事物处于上下通彻、左右兼顾的稳定和谐的状态。

“天人合一”最早是庄子阐述的,庄子是道家,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这一阐述体现了“道法自然”的核心思想。儒家后来以此发展出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天人合一”是道家与儒家共同的核心观念。只是重心有别,道家重自然,认为要解放人性,顺应自然,必得怡然;儒家以天道为德,认为天道是德行之本,人类道德修行要符合天道。

汉字的字形中可不可以蕴含着道家与儒家共同的核心思维“天人合一”呢?可不可以使字形体现道家的法于自然以达至感觉怡然呢?可不可以于笔画之间传递儒家“上下通”或“与天地参”的“中和”理念呢?或是说可否找到适当的字形结构,营造上下通彻、左右兼顾的气场呢?

这个挑战不需要我们去面对,两千年前,祖先已经找到方法,在字形中达致“天”“地”“人”的“中和”境界。

早期以象形为主的汉字中,有各种与“天”“地”“人”相关的字形符号。《说文解字》指出那时造字的灵感主要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也就是来自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对客观世界观察的角度,多是正面或侧面的,因而象形字中,模拟事物的形象也多是正面或侧面。“天”“地”“人”中有些事物在人们心目中地位至尊,向至尊者敬意要正面施礼,所以,代表至尊者的字形当然要赋予正面的形象。但如何造字,才能既有正面形象,又能表达敬意,还能达致“上下通”即“天人合一”的境界呢?这需要大智大慧。古人在世代摸索中,发现一种造字形制可以达致上述的愿景。

这个形制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反对应的笔画结构形制,即对称性的笔画结构形制,简称对称性结构。含有这种结构的字叫对称字,或叫全角反向字。这些字既能呈现上下通

彻、左右兼顾的“中和”态势，还能使字形和谐、稳重与庄正。

“天”“地”“人”中哪些事物是至尊的？先人经长期观察，认为“天”“地”中，即自然界中，有三类至尊者，它们都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三类至尊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三类基本要素，即：显示事物的基本位素、构成万物的基本质素、呈现万物的基本色素。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数以“九”为大，地数以“五”为大。指天的，有“九天”“九霄”“九星”以及传说中的“九个太阳”等；指地呢，用什么代表大自然的三大要素呢？他们创设了三个“五”，即“五方”“五行”和“五色”，简称三“五”。三“五”是至尊者，是祖先早期对大自然的基本认知与描述。

五方：“东西南北中”，是五个地理的基本方位，用来判断事物的位置与变动。根据风向或日月星辰的位置，可以掌握时间与气象的变化，可以适时耕牧渔猎，还可以在出行往返时找到定位，在迷路时走出困局。

五行：“金木水火土”，是古人认为生成万物的五种基本质素，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饮食与灌溉需要水，煮食与取暖需要火，制作器具需要木和金，耕牧与栖息需要土地。人类的生存离不开“五行”。

五色：“青赤白黑黄”，指呈现万物姿彩的五种天然颜色。三千多年前，祖先就以“五色土”来认知华夏广袤大地的土质。赤色是黏土，黄色是硝土，白色是碱土，黑色和青色是含腐殖质的土，青土还表示能常年生长青绿植物或青山绿水之地。（“五色土”之说在《山海经》《禹贡》《周礼》《史记》等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

古人认为三“五”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五行”中蕴含“五色”，金——青色，青铜之色；木——黄色，木质主色；水——白色，浪花之色；火——赤色，焰舌之色；土——黑色，沃土之色。“五色”也可以表示“五方”，青——东部沿海，青山绿水之地；赤——岭南大地，红土之乡；黄——中原，黄土高地；白——西部，贫瘠的大漠与戈壁；黑——塞北，沃土草原。古人用“五色土”表示中华五个方向的疆土，显示地大物博，多姿多彩。古人还用“五行”为天上五颗较明亮的星辰取名：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因为他们观察到，金星色白、木星色青、水星色灰、火星色赤、土星色黄。除外，他们还用“五行”对应人体的五脏，以示相辅相生之理：肝属木，藏血以济心；心属火，热以温脾；脾属土，化生水谷精微以充肺；肺属金，清肃下行以助肾；肾属水，精以养肝。古人这些认知，说明三“五”与人类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是古人心目中权重性的要素，即至尊者。

如果三“五”是“天道”中的至尊者，那么“人道”的至尊者是谁呢？

“人道”中的至尊者就是能导引“天人合一”的圣贤与他们的伟绩。传说中的圣贤“五帝”就是最受敬仰的至尊者。古人认为这些至尊者是顺应“天道”、受命于“天道”的，是“天人合一”的代表。所以，他们也用“五方”“五行”和“五色”来象征“五帝”，以表达对圣贤的敬重。如：东方青帝伏羲，木帝；南方赤帝神农，火帝；中央黄帝轩辕，土帝；西方白帝少昊，金帝；北方黑帝颛顼，水帝。（又一说指金帝颛顼，木帝帝喾，水帝尧，火帝舜，土帝禹）

对三“五”的敬畏，对圣贤的敬重，先秦时已反映在字形创造中。从《古文字谱》^②《战国古文字典》^③《战国文字编》汇集的古字所见，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三“五”各字。每个字都有十多种形态，都呈现出以反相对应性为主的结构。以“东西南北中”五个

方位字为例,可以看到甲骨文时期,五个字都已经出现过对称形或近似对称形。(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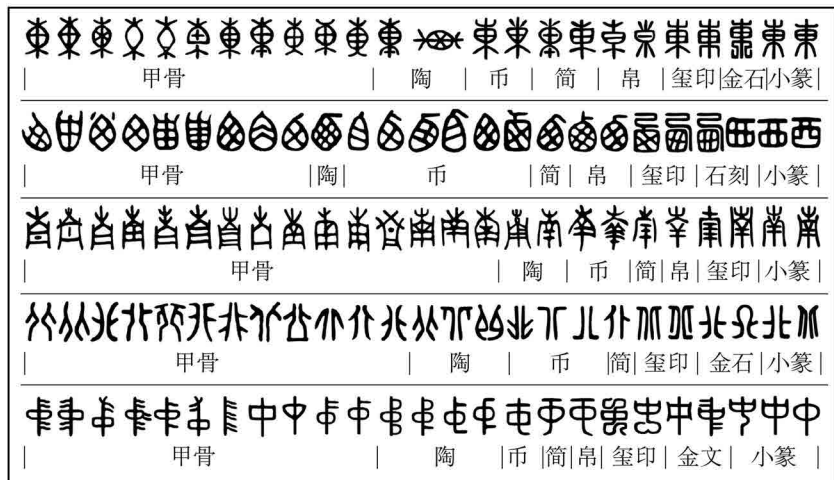


图 1 “东西南北中”部分古字及其载体示例

图 1 所见,这些古字,大部分正置,也有一些斜置;大部字体是对称的,小部分的部件反向对应了但并不完全对称。其中,“西”与“中”虽然出现过一些并不对称的字,但它们主要部件也具有反向对应性。如古“西”字中的“〇”形与“凵”形外廓部件,多是对称的。古“中”字的字形也多是对称或近似对称,其中一些字形虽然附加了飘带式的不对称的笔画,但主干笔画“中”仍具反向字对应性。

这五个方位字的形态在先秦古陶、古币、简牍、帛书、玺印等载体中,有所变异,但多维持着反向对应的特性。

经过先秦千多年的探索与筛选,到了秦汉时期,对三“五”各字更为重视,治字者给这些至尊者赋予更加严谨的左右式对称性结构,使之形象更为庄重和谐。

三“五”各字在秦汉时定形为:

五方:“东西南北中”,秦小篆为“東 西 南 北 中”,除了“西”是部件反向字外,其他四字都是左右对称字。“西”字战国时有作对称的“𠄎”,到了汉代隶书,将“𠄎”又改回“西”。至此,“东西南北中”五字,全部定形为对称字,而后楷书的“东西南北中”与宋、明体的“东西南北中”等,也都维护着这种对称结构。

五行:“金木水火土”,秦小篆为“金 木 水 火 土”。其中,“水 火 土”为左右对称字。“水”字商周时作“𠂔”,象征流动形态,是对角式对称字;战国时币文有作“𠂔”,是左右对称字;秦小篆作“水”,承继了流动形态,也是对角式对称字;到隶书时作“水”,近似左右对称字(亚对称字)。“金”字在先秦时有对称的“金”或“𠂔”,汉隶还原作对称的“金”,宋、明体也定格为“金”。这些字在发展中虽然外形有所变化,但反向对应性不变。

五色:“青赤黄白黑”五个字早在商代都已是对称字,秦小篆作“青 赤 黄 白 黑”。

还有对人主的指称:王(王)、主(主)、帝(帝)、皇(皇)四字在商周时也已是称字。另

一个指称人主的“君”字，周时有写成“𠄎”“𠄏”等对称形字，秦小篆改为王者侧坐的象形字“君”，篆以后的各字形都定为“君”，是部件式反向字。

把指称上述众多至尊者的字形设计为对称性的，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先人深思熟虑后的成果。以对称性的端庄，表现出敬畏与尊重；以对称性的平衡，展现了稳重与对结构美的追求；以对称性的上下透彻，左右兼顾，体现出“中和”的取态。这种对称不是折中，不是和稀泥，也并非平庸、死板，而是向中看齐，向中靠拢，向中调适，不偏不倚，使两个左右极端呈现对称性。只有对称才能显示正面形象；只有正面展现，才能表现端庄；只有端庄，才能蕴含敬意；也只有对称，才能平衡；只有平衡，才能稳定；只有稳定，才能和谐。在小篆中，我们看到先人以精心设计的对称性，来建构“天道”中的三“五”字形；以致诚的“人道”，表现“天人合一”，达致“中庸之道”所追求的境界。

除了三“五”字形与人主字形外，还有许多大自然元素及人类基本活动也多用对称字或亚对称字来表达，我们从中也可以进一步感受到“中和”的境界。如：

与大自然有关的，如天体：对称的𠄎(天)、日(日)、星(星)、雨(雨)、雷(雷)等，亚对称的云(云)。地理：对称的山(山)、丘(丘)、岗(岗)、嵩(嵩)、岳(岳)、谷(谷)、穴(穴)、川(川)、泉(泉)等。生物：对称的草(草)、木(木)、竹(竹)、果(果)、卉(卉)、牛(牛)、羊(羊)等。物态：对称的大(大)、小(小)、高(高)等，亚对称的平(平)、宽(宽)。

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人造环境：对称的有田(田)、井(井)、宫(宫)、室(室)、舍(舍)、台(台)、门(门)、窗(窗)等。农耕产品：对称的有米(米)、豆(豆)、粟(粟)、茶(茶)、苗(苗)等，亚对称的禾(禾)。人造器物：对称的有车(车)、鼎(鼎)、杯(杯)、盅(盅)、缶(缶)、丝(丝)、矢(矢)等。人类动态：对称的有行(行)、立(立)、坐(坐)、来(来)、去(去)、言(言)、喜(喜)、乐(乐)等，亚对称的哭(哭)、笑(笑)等。

手数：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八(八)、十(十)。“七”，秦之前多作对称的“十”字形，后为了避免与“十”字撞字，改“丨”划为弯，成了“弌”。还有“九”，因古音同“勾”，仿勾为形，未作对称字形。

这些字都与生活息息相关，除了上述对称字与亚对称字外，还有数量更多的部件反向字。以《说文解字》录字统计，在9353字小篆中，全角对称字就有947个，虽然只占总数约10%。但其中111个作为字根，既可以成为部首又可以成为从件，与它们相关的字，不管是全角反向字还是部件形反向字，都成为含有对称结构的字，字数多达7272个，占总字数77.75%。就是以现代简化字的几个常用工具书统计，反向字也都高达总字数75%以上。统计表明对称性结构形制在汉字中占有主导地位，也说明“中庸之道”在汉字“书同文”工程中的重要影响力。

反向对应字形结构是充满智能的汉字形制。有了这种形制，书写者在书写时会以“中正”意识自律，不管字形中有无中轴笔画，都会努力使字形的左右或上下相应的笔画表现出“中和”的字德。对称性结构中所传递的中正、平衡的意蕴，方正性的字块中所展示的中和、稳重的字态，二者互相呼应，形成一方安宁祥和的气场。如把对称的左右视为兄弟，那么就是兄弟互敬；如视为夫妻，那么就是夫妻对拜。如把对称的上下视为父子，那么就是

父行子随。这些是人们可以从对称字中感受到的字德。字德可以陶冶人德,可以折射人德。以“中正”“中和”的心态书写文字,可以修心悟性。与这些对称字相处日久,书写者与阅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中庸之道”的熏陶,感受到“和谐”的愉悦,心理的修养会潜移默化。以三“五”对称性字为例,有心者或智者还可以从中悟出“中庸之道”等更高的哲理,如:对天下而言,要敬畏自然,维护尊者;对治国而言,要树立中央意识,以中央为依归;对生活而言,不能偏激也不能偏弱,不能偏取也不能偏废,适可而止;待人处事,要和谐共生,一视同仁,强能扶弱,弱亦尊严……对称性意境留下很大的领悟空间,这是世界上其他字形所没有的气场。

除了字形的反向对称性折射出汉字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内涵外,还有字块的正形化,也有这一效应。汉字正字的形范,成就了汉字端庄、平稳、安宁、持重的主体形象,也蕴含着是不偏不倚、中正平和的字德。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中庸之道”所推崇的“圣人不动情”、注重内心、不发生喜怒哀乐偏激情绪是一致的;与道家的清静释然、“万物与我为一”的追求也是和合的。

秦统一天下,焚书坑儒,企图摧毁儒家、道家、阴阳家的人德,但却在小篆中保留了“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字德,甚至通过反向对应形制,使这种字德更加系统、更加规范、更加完善。东汉时,儒家董仲舒推行“独尊儒术,抑黜百家”,排挤打压道家,但也藉道家“天人合一”观念发展出儒家的思想体系。历史往往惊人相似,说明了历代的改革者在文化继承上对政敌的精华观念都具有慧眼,都能巧妙地予以汲取,甚至发扬光大。

秦以后的隶、楷、魏、宋等字体,仍然恪守着这种字德,都使反向对应性成为汉字的主体特征。自秦以降,反向性对应形制能够经受两千多年历史风浪的冲击,坚固不溃,是因为它具有科学性与哲学性的活力。这种活力,使汉字成为有形体、有灵魂的文字生命。

汉字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表现植物的基本字根多是对称性或近似对称性(亚对称性)的,是以正面形态的象形字为主的,如对称性的木(木)、艹(艹)、竹(竹)、米(米)、果(果)、茶(茶)、苗(苗)等,亚对称性的禾(禾)、黍(黍)等。但表现动物的基本字根,除了牛(牛)、羊(羊)外,多是不对称的,是侧面形态的象形字,如:人(人)、虫(虫)、鸟(鸟)、犬(犬)、马(马)、虎(虎)、豕(豕)、鹿(鹿)、鱼(鱼)、象(象)、龙(龙)、鼠(鼠)、龟(龟)等。先人这种设计,不等于轻视动物。因为植物是静态的,赋予对称性与正面形态可以展示它们扎根于土壤的稳固生态。而动物是动态的,用侧面可以显示动感的足、爪、角、鳍、角、翼等肢体,能展示其栩栩如生的活泼性。至于牛(牛)、羊(羊)是正面形态,因为古时祭祀多以牛首、羊首为主祭品,所以取正面首部为敬。这些形象的建构,说明造字者找到了最适当的方法来表现大自然的生物,完全符合“中庸之道”之“庸,用也”的内涵,体现善“庸”(善用)的高深智慧。

(二) 汉字的均衡形态蕴含着阴阳学、易经的哲思

均衡性是汉字另一特征,也是反向对应结构形制所产生的,是小篆及而后所有字体所共有的。《论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还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

均,指均匀、公平、势均力敌;衡,指权衡、掂量、比较。

均衡概念源自阴阳学。阴阳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范畴,它的历史比儒、道、法还要早一千多年,对儒、道、法都有影响,更成为道学的理论支柱之一。四千多年前的夏朝《连山》(亦称《连山易》)中已有“阴爻”和“阳爻”之说。《易经》中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亦指“阴”和“阳”。古代哲学家认为宇宙间万物万象内部都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属性,他们借用阴、阳代表相互对立又相互作用的两方,并把万物万象分为阴与阳两大类。周文王的《周易》在演绎《易经》时,就是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论证和描述其中的运行规律。阴阳学说重视阴阳均衡,认为宇宙是阴阳二气相辅而成,阴阳二气掌管万物;还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宇宙的基本规律。阴阳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推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这样阴阳才能长期共存。阴盛阳衰,或阴衰阳盛,都不吉利,只有阴阳均衡才能维生旺命。这是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思维。正如《周易·系辞》所言:“阴阳合德,则刚柔有体。”这种阴阳对应的均衡法则,对许多领域都产生影响。如:在居家上,讲究阴阳平衡的环境风水,以利家兴业;在政治上,阴阳平衡体现为刚柔并济的治理之道;在建构上,寻求阴阳平衡的意识更进一步发展成追求结构上对称平衡的美学观念;在医道上,认为体内阴阳调和,才能维持健康。《素问》有“德旋周普,五化均衡”,讲的就是体内阴阳互补互济,互相平衡。

既然万物万象内部都存在着对立的阴阳两种属性,都需要均衡性。那么文字是否也是这样?汉字虽然是人造的,但也是一个有形有魂之物,它有阴阳吗?如果有,是怎么体现的?是怎样界分的?

阴阳的最初含义很朴素,表示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到气候、时令、方位、性别、动态等,泛指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两方。如:昼为阳,夜为阴;暖为阳,寒为阴;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外为阳,内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动为阳,静为阴;白为阳,黑为阴等。依照阴阳这种延伸的定义,我们不难划分出汉字字形的阴阳两界。借用“田”字格套字,每个字形都可以分成左右两区,左为阳,右为阴。不论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不论是左右结构还是左中右结构,不论是上下结构还是上中下结构,不论是全包围结构还是半包围结构,都可以作左阳右阴划分,使界限立明。

阴阳分出来了,均衡性又体现在哪里?

在全角对称字中,左右笔画是反向对应的,均衡性是容易感受到的,如“田”“串”“柰”“吕”“晶”“鼎”“燕”等字,不管字形有没有中轴笔画,左右的均衡感都十分明显。但在非全角对称字中,左右笔画并不一定反向对应,如“勾”“女”“匠”“海”“征”“疤”“边”“虎”等字,它们有均衡性吗?

在汉字中,均衡与对称是两个概念,均衡与字形对称性所具有的平衡并不相同。字形对称性平衡是指形的平衡,是字形中对立双方的笔画结构具有反向对应性,具体说就是反向双方的对应笔画具有等长、等高、等斜、等角等特征。而均衡是指势的平衡,是对立双方具有对等或近似的气势,具体说就是双方的分量、阵容、气场具有同等或接近的态势。对称性是形状展示,是画面,是显性的特征,可以直观看到的;而均衡性是因字制宜的过程,是隐性的特征,要借助“田”字格作审视才容易感受到。均衡需要因字制宜,这个过程符合

《说文解字》中“均,调也”和“衡,平也”的原则。只有通过调适部件的形态,才能使字形左右两方达到势的平衡,也就是阴阳均衡。

例如“槽”与“槽”两字,两字的左右都有部件“木”与“曹”。“槽”字左窄右宽,但给人均衡感;“木曹”字虽然左右同宽,但有失衡的感觉。这是因为在“槽”字中,左边笔画少,右边笔画多,左轻右重。而在“槽”字中,笔画多的部件“曹”,有一小部分越过中界,加强了部件“木”的位势,使笔画少的左侧分量与阵容都得以增强。经过这样因字制宜的调整,使整体字形有了阴阳均衡性。

左右结构的字,如果两边笔画数量悬殊较大,都需要这种调配,以使左右趋近均衡,具稳定感,有视觉美,不会令人感到重力歪偏。

对称与均衡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共融于一体。前面提到的全角性的对称字就是二者的共同体。在这类字中,均衡中含有对称,对称中兼有均衡。不过,这种对称字只占总字数10%左右,近90%的汉字不是对称字,后者中有的字虽然某个部件具有对称性,但并未令整个字呈现对称性。还有些字所有部件都没有对称性。这些字中,对称与均衡也不同体,而是各司其位。这种态势说明,全角对称字的字形含有均衡性,但均衡的字形中不一定都含有对称性。对称性是全角对称字与部件对称字的特征,即占75%以上的主体字形的特征。而均衡性则是全体汉字所共有的特征。均衡性弥补了对称性的不足,使左右两边笔画不对称的字形也能表现出和谐的态势,令字形的正形性更为稳定庄重。

均衡的稳定感是人类在大自然中长期观察中形成的审美观念。符合这种审美的造型艺术才能产生美感,令人愉悦,否则,看起来就不顺眼。

今天被广泛应用在构图、建筑、经济、医道中的均衡观念,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已经被先哲们所重视,到了秦国更是被娴熟地运用在整治文字中。

阴阳学、道学的“均衡观”,与儒学的“中庸之道”以及他们所共有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成为汉字的生态环境。确保这种生态的常规化,是秦统一中国后法家的治字措施。由法家强势推行的小篆中,竟然蕴含着他们视如寇仇的儒家、道家与阴阳家追求的境界。这不是一种讽刺,而是一种智慧的融合。因为秦兼并六国之前,文字已有千多历史,商朝的金文、石鼓文,西周太史籀整理的大篆等,已经为文字的笔画结构打下一定的基础。那时百家著述,留下《易经》《周易》《诗经》《论语》《九歌》《吕氏春秋》等众多经典。其文字出自各家之手,字形有正形的也有不规则形的,有对称的也有不对称的,有均衡的也有不均衡的,各有风格,并不统一。秦国治字,不是灭他国之字再创新字,而是清理字形乱象,简化、优化、规范之前的文字。以秦字为主,吸收他国文字之长,删减异体字,推出字形正形化、笔顺规范化的小篆。通过小篆,以均衡性为全体结构,以对称性为主体结构,统一字形风格,达致“书同文”的法治效果。这一改革,客观上承继了“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与“均衡观”为汉字灵魂的观念。这一种融汇性的智慧,表达了法家也注视实际效应、取他家之优为已所用的政策取向。

秦之后,随着时代的演变、字形的发展,汉字中对称性的权重因一些字形的简化而有所削弱,对称字的数量有所减少,但均衡性的权重却未受丝毫影响,所有正字的字体都坚

守均衡法则。均衡性不但规限旧字,而且制约以后的所有新字。

(三) 汉字的反向性展示出强势法治的密码

先秦古字繁杂,不但字类多、字形多,而且异体字也多。西周周宣王曾推出大篆,但未能统一文字,到春秋战国时期,周室权崩,诸侯割据,各行己政,各有字款,不统于王,使繁杂的字局更加混乱。秦统一中国,以法家为中坚,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进行一系列强势改革,包括对文字的整治。大刀阔斧删除异体字,为官定文字小篆的书写立范,严格规定了字形的块状、笔画线状与运笔顺序。一系列严厉的整治措施,都折射出法家的施政魄力。

1. 从秦人精简文字中看反向对应形制在治字中的重要地位

先秦时异体字众多,据《战国文字编》收录,战国时被列为正字的古文字有 18 288 个,分属 5 618 字目,平均每个字目有 3 种以上异体字^④。其中 3 560 个字目都有 10 种以上的异体字,有的多达数十种。而根据《古文字谱》所录的先秦异体字,现象为更严重,如“皇”“七”有 20 多种异体字^⑤;半“平”有 40 多种^⑥;“子”“尊”有 60 多种^⑦;“寿”“阳”更超过 100 种^⑧。这种现象给各国之间文字的辨认与交流带来诸多不便。

秦灭六国后,取消了六国大量的异体字与生僻字。东汉《说文解字》收集小篆 9 353 字,绝大部分源自秦代,其字数与已知的战国时期 18 288 个不同字形的古文字相比,精简了近 9 000 字,成果卓然。这一措施,加快了以秦字形为主的汉字的流通使用,也提高了国人对新法、新律文本的认知,有利于以法治理统一后的国家。同时,还可以削弱六国的文化痕迹,淡化了六国的情结。

通过《说文解字》与《战国文字编》《古文字谱》的文字对照,可以发现被秦国精简的近 9 000 字中,除了笔画较复杂的字外,多是外形不规则的字。保留下来的,除了笔画较简外,多是形块较庄正或含有反向对应性部件的字。这些字经过进一步规范,更加突出字形的反向对应性。对字形的这种取舍与改良,说明规范化与反向对应形制在秦人治字中的重要地位,是治字成功的法宝之一。

2. 字块正形化传递出令行禁止、天下守规的管治威严

先秦的字形除了部分大篆具正形性外,其他字体多是不规则形状。秦实行“书同文”时,在大篆的基础上,简化笔画,改良形块与运笔方法,发展出标准字小篆。小篆字块呈正长圆形,即水平端正的长圆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字块形状的追求,它在当时无疑是一项令行禁止的条律,是结束战国末期文字形态各自为政的措施。正形的字块都受到一方无形边界的限制,字形内所有的笔画的末端都不能越出无形的边界。正形的边界犹如一座城池,字形笔画则如城内的街道,受制于城墙城门,不能延伸到城外。今天,书写的初学者被要求在“田”字格内习字,不容出格,这与秦代对字形正形化匡约的影响不无关系。

字块正形化,除了追求字块统一方正外,还宣示了在国家在管治上卫戍四方、约束行为、不容踰越雷池半步的法规意识。对字形的规管,是对文字用户的规管。文字用户都是有识之士,都是容易影响社会的人士。他们对字块形状的恪守,对字规的遵从,无形中会产生对立范的政权臣伏的意识。这种意识发酵后,可以加快秦王朝对社会规管控制的步伐,这是字块正形化的延伸效应。

字块正形化对后来字形的发展影响深远,隶、楷、宋、明体等字形虽然不再呈长圆形,隶书为扁方形,楷书及其后的各字体都追求正方形,匡约字形的几何形状虽然不同,但都是受正形化的约束,都呈现水平端正的形态。不论是竖排还是横排,都给人庄重、齐整、和谐的美感。每一个正形化的字块都像扎稳阵脚、沉着持重的金刚,这是其他民族文字所没有的气势。当千百个同级的方正文字,成行、成段、成篇排列组合时,犹如训练有素、身高统一、实力雄厚的军团方阵。如果没有统一的正形字块,那么,字群排列时,就会高矮参差、宽窄不匀、粗细混编、行列凹凸,杂乱的阵容似若组织涣散的乌合之众。

3. 笔画结构的对称性显示出以中央为尊的集权意识

小篆是以反向字为主的字群,反向字共占小篆总字数 87% 以上,不论是全角反向字还是非全角反向字,每个字至少含有一个对称性的部件。在对称性部件中,不论有无对称轴,部件左右两边的笔画都是对称的,也就是都以中间有形或无形的中轴为对称标杆。对称性的笔画从美学角度看是一种形体结构美,如从政治角度看则有更深的含意,它与环卫中央、向中央看齐、以中央为准的政情相吻合,是秦朝以中央唯尊意识在字形上的一种体现。

小篆作为官方文字只流行了五十多年,到了汉代不久,就被笔画更简单、更易书写的隶书所取代。小篆后来只作为书法艺术而存世。尽管如此,笔画结构的反向对应形制与规范化意识仍然主导着汉字的发展。除了行、草二书外,后来所有的正字字体,笔画结构基本没变,中央唯尊的意识没变,改变的只是运笔风格与笔线艺术不同而已。西汉延续了这种意识,还把文字规范化列入国法,吏民上书写错字要判罚。这一严厉措施进一步确保了汉字的形制、强化了规范化意识,影响深远。

除对称性部件外,小篆每一笔的书写规则也蕴含这种意识。小篆运笔要求中间落笔然后两边展开。也就是先中间,后左右。中间落笔——体现了中轴主导的思维,方便营造显性的中轴笔画,或产生隐性的中轴意识;两边展开——可以把握左右的反向对应,尤其是进行对称性的建构。这种运笔规则,除了方便表现反向对应性结构外,客观上也宣示了中央主导、周边拱照、左右互相制衡等中央权威。

4. 运笔规范化透析出施政有序、律法严明的治国方略

小篆要求“中间落笔、两边展开”的书写法则,除了具有容易表达反向对应的功能外,还使笔画线状统一,呈现线性之美,为文字运笔规范化开了先河。秦国重视运笔顺序与线状匀称的意识,影响了后来各字体的书写。小篆后,各字体虽然不再采用“中间落笔、两边展开”的书写方法,而采用先横后竖(如“干”)、先撇后捺(如“八”)、从小到大(如“主”)、从左到右(如“林”)、先进后关(如“田”)、先中间后两边(如“水”)、从外到内(如“回”)等书写顺序,但重视运笔规范化的意识成为固有的取态。不同字体的运笔各有风格,但都以上述顺序为规范,并注重起笔、收笔与边角笔触的形态美。如:隶书起笔如蚕头,收笔似雁尾,右端及下端笔锋外露;楷书笔画平直,规矩整齐,折画与钩画的折处行笔先顿再折;魏碑笔力雄劲,棱角分明、点画峻厚,有斩钉截铁之气势;颜体方正雄浑,笔画横轻竖重,笔力圆厚,气势庄严;宋体与明体尊正端庄,点、撇、捺、钩笔画都呈现尖端棱角,横画笔端与钩画转角都有装饰角。各字体严谨的书写态度,都有着秦国对文字严格要求的遗风。

综上所述,汉字字形中的正形意识、对称意识、中央意识,都与秦国法治的理念与措施相呼应。以反向对应形制为主导,推行字形规范化,体现了以法治字、以法治文的理念,传递出在法规面前一视同仁、任何人都要绝对臣服的信息。这是以法治国、以法治世政治方略在文化领域的投影,折射出秦国统一四方的气概。如果没有这一书写运笔规范化的法则,秦国难以实现“书同文”的宏图。“书同文”与“车同道”“度量衡的统一”等措施,互相支持,增强了社会对国家统一的认同。这些意识,也融进了汉字的字德,两千多年来成为每个汉字的基因,也成了书写者自律的潜规则。

二、反向性是汉语传承不息的重要密码

(一) 汉字是世界五大古文明中仅存的硕果

世界文字历史源远流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南欧多瑙河谷罗马尼亚的 Cucuteni 及周边多个村落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泥板、陶人等文物,上面压写的古文字,把人类文字史推前了一千多年,使长期以来四大古文明的说法,要重新洗牌。以年代久远排序,新的四大古文明是多瑙河古文明、两河古文明、尼罗河古文明和印度河古文明。如果计入黄河古文明,则是五大古文明,或叫五大流域古文明。之所以不称为五大文明古国,是因为那时多瑙河流域还没有国家与等级制度。发掘出来密集的遗址显示,那时已经有了近似城市的群居社会,有矿址,也有了工艺制作坊;出土的数以千计泥板与陶件上的刻画,显示男女平等,更重要的是有了文字符号。^⑨

五大古文明中,黄河古文明虽然出现较迟,但却是硕果仅存的一员。黄河古文明中最令人骄傲的汉字,是世界文字中流传最久的语言符号。

汉字为什么源远流长?它传承不息的生态与它的反向性是否有着内在联系?要探索这一空间,首先要简明梳理五大古文明的文字发展:

7 000 多年前,多瑙河河谷的文字已经从绘图记事、象形文字,进入表意、表音的象形字符与抽象字符混用的阶段,有 700 多个字符,是世界已知最早的文明。字符的线段大多结构简单,有的类似今天的 V、U、L、F、Y、M、X 等字母,有的像楔形符号(见图 2)。^⑩



图 2 刻着类似英文符号的多瑙河谷陶人



图 3 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

6 000 多年前,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流域)的苏美尔文字,已走过象形字符与抽象字符混用的阶段。1 000 年后,其文字更进入象形文字逐渐消失、向着类似字母的楔形符号——古巴比伦文字演化(见图 3)。当时的文字可以用以记述史事、法律、贸易、医学、文学、碑文、祷辞及数学列表等大量高度文明的信息,甚

至可以演算一元二次方程。那时,黄河流域正处于文明萌芽期,先人用结绳记事。

5 000 多年前,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字,也进入象形字符与抽象字符混用的阶段。文字书写从圣刻体(或称圣书体)到僧书体(或称僧侣体),再到世俗体。由庄重书写向草写方向演变,而后又发展出一套音节系统,出现了字母的萌芽。同一时间,印度河流域也出现了图画与形符、意符、音符混用的印章文字,也向着类似字母的表音文字发展。那时,黄河流域进入了夏代,处于文字史初期,有了绘图记事,开始出现表形、表意的象形字符,先人可以在龟甲或牛骨上以数十个字刻记单一事件。再过 1 000 多年,出现了篆书,文字开始向系统化与规范化发展。这时,拉丁美洲的玛雅文字也开始形成。



图4 埃及象形文字与僧侣文



图5 图画与形符、意符、音符混用的古印度印章

多瑙河古文字流行了 1 500 多年后,随着移民潮的到来,在南欧与西亚字符的冲击下,逐渐被淘汰^①;两河流域的楔形字符风行了 1 000 多年,后来被更为简约、更为字母化的阿拉伯文字所取代;埃及古文字流行了 3 300 多年,最后败在闪米特人更简易的科普特体(古希腊字母)之下;古印度的印章文字也存在了 1 200 多年,在类似字母的表音文字阶段突然消失了,有学者认为消失的原因与雅利安人的迁入及印欧语的传播有关,但有待进一步考古。在汉字之后兴起的玛雅文字流行了 1 500 年也退出舞台。只有黄河流域的汉字及其文明一枝独秀,穿越 5 000 多年时空,今天依然健存,充满活力,今后仍将传承不息。

(二) 反向性发展造就了汉字不可替代的丰富性

世界文字发展的主流是从形的书写向意的书写、再向声符的书写方向发展。如作细分,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绘图记事—以表形为主的象形文字—表形与表意混合的象形文字—形音义混合的表意文字—表意文字与表音的抽象符号混合的文字—抽象声符(字母)。

文字书写的这种流向符合语言活动的发展规律。语言活动有两个台阶:一是话语活动,二是书写活动。话语活动是第一台阶,先有话语活动,然后才有书写活动。话语活动产生了记录思想情绪、记录事物等会话交流的需要。于是,便有了绘图记事,进而衍生出字符。话语活动产生无形的声符,书写活动则产生有形的字符。

为什么书写活动从声符表达的需求出发、最后到达字母阶段的过程,是世界文字发展的主流呢?这是因为话语活动是若干个基音与声调组合的表达活动,字母阶段的书写活动是用少量的、可以书写的、有形的声符来表达无形的基音,以取代曾经用过的、繁杂的意符。当书写活动与话语活动都能用若干个基本音符来表述时,二者自然合拍,为世界大多数民族所接受,并成为文字发展的主流模式。

全世界的文字都经历了前期的四个阶段,但进入了形音义混合的表意阶段时,汉字与西方文字分道扬镳,逆向发展。

西方文字在表意文字阶段后,都往抽象的声符字母方向发展,有的文字(如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甚至滑过表意文字与表音抽象符号的混合阶段,直接由表意文字跳到抽象的字母。多瑙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诸多古文字消失,都是把舞台让给新兴的或外来的更简单、更易写、更抽象的声符字母。这一进程符合了上述语言活动的规律与需求。

汉字在前期的四个阶段中,从大篆到小篆,再到隶书,字形从繁到简,笔画从难到易,字数从多到少,也是朝着减少字符与易于书写的世界主流方向发展。如:改圆转笔画变为直线笔画,字符从战国时的 18 288 个大篆骤减到秦汉的 9 353 个小篆(据《战国文字编》与《说文解字》字数比较统计)。但在秦汉以后,汉字停留在表意阶段,再也没有跟随世界文字的潮流前行,而后更是背道而驰——当其他古文明的文字都淡出表意的江湖,朝着抽象字母的山顶进发时,汉字却固守山下表意的营垒,而且大张旗鼓、增兵扩军、拓展地盘。

当其他文字的笔画越来越简单(如英文字母简至不超过四画)时,汉字却以多笔画文字为主力(最长达三十一画)。尽管 20 世纪也简化了数以千计文字的笔画,但仍保留了五万多个笔画超过四画划的文字。

这种生态,使汉字偏离以声符字母书写的主流方向越来越远。

当其他文明的文字数量越来越少、少至只有二十多个声符字母时,汉字却反向发展,不断壮大以意符为主的字群。其数量膨胀之快从以下统计可以见到:公元一世纪时东汉有文字 9 353 字(据许慎《说文解字》收录),到了公元六世纪的南北朝有 22 509 字(据南朝·梁·顾野王《玉篇》收录);公元十四世纪的明朝永乐年间,增至 33 179 字(据明·梅膺祚《字汇》收录);公元十七世纪的清朝康熙年间,再增至 48 847 字(据清《康熙字典》收录);到了 21 世纪,更多达 56 100 多字(据《汉语大字典》1 992 年版收录)。

统计可见,从东汉到清朝约 1 900 年间,汉字增加了 39 500 多字,平均每百年增 2 000 多字。其中以明朝永乐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最甚,仅三百年间就暴增了 15 000 多字,平均每百年增 5 000 多字(见表 1)。文字数量如此膨胀,是世界文字中绝无仅有的。

表 1 古今主要工具书收录汉字数量比较表

工具书名称	编者/出版年代	字体及字数
《说文解字》	(东汉)许慎	仅录小篆 10 516 字(异体字 1 163 字,实为 9 353 字)
《字林》(已佚)	(西晋)吕忱	仅录小篆 12 824 字
《玉篇》	(南朝·梁)顾野王	仅录楷书 22 509 字

(续表)

工具书名称	编者/出版年代	字体及字数
《字汇》	(明)梅膺祚	仅录宋体 33 179 字
《康熙字典》	(清)张玉书、陈廷敬	宋体 51 742 字(重复与错置 2 892 字,实为 48 847 字),另录小篆 10 293 字
《中文大辞典》	1968 年版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宋体 49 905 字(部分含甲骨文、金文、小篆、隶、楷、草书等比较)
《辞源》	1979 年版(商务印书馆)	宋体 12 890 字
《汉语大字典》	1992 年版(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联合出版)	宋体 56 100 多个。含部分小篆、隶、行、草、宋体比较。其中小篆 9 800 多字。
《辞海》	1999 年版(中华书局)	宋体 19 485 字
《战国文字编》	2001 年版(福建人民出版社,汤余惠主编)	宋体字 6 915 个,相关古文字字形 20 054 个。
《新华大字典》	2004 年版(商务印书馆)	10 100 字。含小篆、隶、行、草、宋体比较。
《新华字典》	2011 年版(商务印书馆)	宋体 11 200 字

表意文字在汉字与西方文字之间命运的反差,是因为西方的表意文字大多与声符分开,表意文字加声符才能满足语言表达的需求。当表意文字无法适应语音语法变化的活泼性时,而抽象声符字母的拼写又可以表达语言的需求,文字当然就朝着字母方向发展,表意文字自然被剥离、被淘汰。而汉字的表意文字是集形音义于一体,无须另加声符,即可表达语言。而且,汉字语音与语法的需求不如西方文字活泼,如不需要前置词,不需要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等。汉字语音与语法的基本需求在表意阶段已经得到满足,所以不需要再朝字母化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汉字在表意阶段停滞不前,还因为字形的正形化、结构的均衡化在小篆阶段已经成形;笔顺的规范化、笔画的直线化在隶书阶段也已基本定性。表意字形的结构形制更加成熟,不再需要进一步质化发展的空间。隶书之后的 2 000 多年间,尽管增生了数万新字,尽管出现了楷、魏、颜、宋、明体及现代大量的美术字与电脑字体,但它们都遵从之前的结构形制,不同的只是笔画风格。这一态势也使汉字的持续发展失去动力。汉字的生态,使世界文字形成了表意的形符与表音的声符两大模式。西方文字都以抽象的声符承载语言的需求,而汉字则孤军固守,继续以形音义混合的表意字符承载语言的表达。

汉字的个体字符绝大多数都有字义,甚至有表词功能。西方的个体字母则没有字义、更没有表词功能,只能以声符的拼写呈现词意。在这一点上,汉字比西方的字母拥有绝对的优越性。但在不断出现的新概念、新事物、新需求面前,汉字就处于劣势。西方文字仅仅应用已有的数十个字母的组合(有的少至 26 个,如英文字母),就能轻易生成各种新词汇。而汉字则显得无力招架,原有的个体字符无法表达新的概念时,只有造出新字符,才能满足新的需求。如化学周期表传入中国时,许多元素都要靠造出新字来表达。“氦”“氩”“铀”“铯”“碲”“砷”等新字,就是这样出现的。还有,为了满足词语细分的新需求,汉字也要增加字数。如第三者称谓的细分,英语是“he”“she”“it”,汉字则细分出“他”“她”“它”,繁体字中还有“牠”(用于动物)与“祂”(用于神祇)。西语的细分以 h、i、t、s 组配拼

写,都是运用已有的字母,并没有增加新字母,但汉语却要造出新字。这也是汉字数量越来越膨胀的原因之一。

所以,明朝之后,当西方文化东进渐强时,当社会急剧发展时,汉语新字就井喷式地暴增。虽然二十世纪汉字曾有过数次简化笔画的工程,但并没有废除被简化的繁体字,而是简繁共存,结果,推行简化字后,汉字数量不减反增。汉字这种反向的发展还在继续,只要有新概念、新事物、新需求,字数还会持续增加。

汉字的反向发展,带来了字库不断膨胀的烦恼。二十世纪,语言专家曾尝试改变这种大步倒退的生态,企图以注音或拼音取代汉字,但都无功而返。最后,注音或拼音只能作为汉字的读音标识,辅助汉语初学者的学习,并不适合出现在日常书写中。

汉字的反向发展,字数量的不断增长,使学习汉字更为艰难,需要调动更多的记忆。这种畸形生态,是一种固执。但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发展却造就了汉字的丰富性,反而衍生出一种优势,强化了汉字的不可替代性,成了汉字传承不息的密码与华夏文明的基因。所以,从传承意义上说,这种“不合时宜”的较劲,反而成为一种美——文字生命的固执之美。

另外,为了管理数以万计的汉字,先人在造字早期时,就梳理出一些代表性的文字,作为字根,进而发展成部首,并把所有的文字归辖于相关的部首。部首的运用,令繁杂的文字变得身份明确,归属有处,提高了汉字的系统性。使汉字虽然字数众多,但阵容不乱,检索方便。这些也优化了汉字族群的质量,进一步增强了汉字的不可替代性,使汉字的反向发展,仍有生命的坚韧性,仍有在世界文明中继续存在的空间。

(三) 反向对应形制造就了汉字顽强的生命力

除了字汇丰富性不可替代外,汉字的反向对应形制,也是汉字传承基因的组成部分。反向对应形制使汉字形体具有方正美、均衡美、稳重美与主体的对称美,还使笔画结构能蕴涵儒、道、法、阴阳学等智慧美。这些也是世界其他字母所无法承担的。这些美强化了汉字的个性,使它的华夏文明传承力更加倔强。

虽然汉字的书写不如字母那样轻巧、简便、流畅,但汉字所具有的内涵质量是字母望尘莫及的。特别要指出的是,汉字强大的表意字汇,主力来自反向字形。没有这些字形,汉字就没有这么丰富的表达功能,就没有这么顽强的不可替代性。如果说汉字庞大而丰厚的字汇是繁茂的绿叶,那么字形的反向对应形制,则是汉字粗壮的树根与坚韧的树干。反向对应形制使汉字展示出不可拒绝的魅力,具有抵御外来文字侵蚀的反制力,能牢固地扎根在自己的土地上,成长为五千年长青不衰的丛林,自成气候,撑起一片蓝天。汉字的土地也曾被他族入主,也曾受到入侵文化的冲击,但汉字没有被外来文化所淘汰,没有在曾经的亡国中灭绝,反而被非汉族的统治者所青睐,使其气场阵容更加壮大。深究其因,正是由于具有上述的不可替代性与执着性。

综上所述,反向性所成就的汉字形态美、灵魂美与活力美、执着美,铸成了汉字不可替代性与顽强的生命力,支持着汉字生命的基本结构和性能。

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支持并传承生命现象中基本结构和性能的主要物质,是基因

(遗传因子)。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分子结构,它的外部是一对互相缠绕的螺形骨架式的磷基,内部是成对的、水平相系的硷基。磷基与硷基之间纵向与横向的有机结合,组成生命的基因。汉字也有类似的特性,形体美与灵魂美犹如一对螺形骨架的“磷基”,互相依托;而活力美与执着美则是内部成对的、水平相系的“硷基”,相互维护。汉字这种“磷基”与“硷基”的有机结合,相互缠绕,相辅相成,共同建构着汉字的体肤、骨骼、品格与性能,支持着汉字家族的繁殖。它们是人工培育的汉字基因,这些基因还衍生成华夏文明五千年薪火不灭的重要密码。

(四) 汉字的持续发展需要维护反向对应性与规范性

在谈及汉字的发展时,需要指出一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展开的汉字简化工程,不是一个全面类推与全面规范化的工程,其法则只适用于后来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8105字,只满足于现代语言生活常用字的需要,即只考虑8105字的通用性、现代性和规范性。由于是局部性的简化与规范化,所以允许《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外的繁体字不作类推简化,可以保留使用繁体字,这就造成了工具书与行文混乱的局面。在内地出版的字典中,除了仅收录简体字根的小字典(如小学生《新华字典》)外,所有在万字以上简繁字并录的大字典,都有部首不统一之弊。以《汉语大字典》的“言”部首为例,其所辖的1115字中,有1012字的左旁是“言”部首,另有103字的“言”部件在字的右旁或下方。如照简化法则,1012字的左旁“言”都以可简化为“讠”。但字典中只有143个左旁为“言”部首的字获简化,其余869字则保留繁体字形。如果含有“言”部首的字,简化的及保留繁体的两种字形共处一文,势必带来了偏旁部首不统一。这仅仅是“言”部带来的不规范的苦恼,还有“门”(門)、“钅”(金)、“贝”(貝)、“页”(頁)、“车”(車)、“丝”(絲)等部首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文字简化是书写的需要,也是发展的方向。但汉字既然要固守表意文字的身份,在简化时就不能弱化表意文字的鲜明个性。汉字的表意特征除了形音义外,反向对应形制也是一个重要特征。历史上,汉字曾经有过一次成功的简化工程,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秦国,把18288字精简成9000字,把笔画复杂的大篆简化为简单的小篆。这是一次全面的、规范性的简化工程,简化后的字不但没有削弱字形结构的反向对应形制,反而强化了,增加了更多的对称字。小篆后来虽然被更易书写的隶书、楷书所取代,但新字体都固守反向对应形制。特别是具有对称性的部首,两千年间中从未被易容,一直是众多部首中的亮点。

秦国成功的汉字简化工程,为文字改革发展树立了典范。祖先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汉字可以改革,可以简化,但不可以削弱它的表意特征,特别是不可以削弱它的主要特征,即反向对应形制,尤其是不可以为了减少笔画而摒弃反向对应性。不但如此,甚至还要强化它的表意特征。

但二十世纪汉字的简化工程,却不尽如人意。简化字中,有成功的,也有败笔。成功的是既简化了笔画,又维护了、甚至加强了均衡性与对称性,如“态”(態)、“变”(變)、“画”(畫)、“灭”(滅)、“关”(關)、“阳”(陽)、“数”(數)、“继”(繼)等字;败笔的,多是摒弃了原有部件的均衡美与对称美,如用源自草书的“门”“讠”“钅”“贝”“页”“车”,取代正体字的对称

部首“门”“言”“金”“贝”“页”“车”。虽然减少了笔画,但使相关的字形都失去生动的形象美或会意美。结果,既削弱了汉字的反向对应形制,也削弱了它的表意特征,还弱化了字形的内涵与历史感,特别是弱化了汉字中儒、道、法及阴阳学等先人智慧对读写者的潜移默化,得不偿失。其中,“门”“讠”“钅”“贝”“页”“车”六个偏旁部首所辖的字,如都依例类推加以简化的话,受影响的字就有 3 834 字(以《汉语大字典》录字计)。这种文字生态的变异,使民族文化的精彩符号蒙受损失。在毁誉参半下,虽然有文字改革部门果断停用了后来几批的简化字方案,但还是伤害了数以千计汉字的反向对应性。更尴尬的是,这种只简化常用字但不简化其他同部首文字的局部措施,增加了汉字字典编辑工作的难度,也使含有较多非常用字文章的书写出现了不能统一规范的局面。汉字这种尴尬的生态,使文字改革进退两难。目前,只能保持通用层面常用字的稳定性,难有全局规范性的作为,除非重新洗牌,进行全面的规范化改革。这个教训,是一个苦果,对今后汉字的改革与持续发展有着警示作用。我们不能让汉字—祖先的宝贵遗产,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弱化了特性,大失光彩;也不能只考虑当下的需求,只作局部的文字革新,而不作历史的、全局的考虑,更不能进一步加剧整体字库规范化的混乱,影响了华夏文化传承的质量。

三、结 语

汉字是祖先高度智能的产物,是世界上唯一至今仍在使用的古文字。汉字之所以传承不灭,与字形结构的反向对应形制以及汉字反向性发展息息相关。反向对应形制,在汉字字块的正形性、字势的均衡性与部件的对称性中,都起着导向性、制约性的作用。它不但造就了汉字形体的视觉美,而且赋予汉字灵魂美。视觉美,使字形具有中正、稳重、平和的形象;灵魂美,使笔画结构之间折射出儒家、道、法与阴阳家等先哲的智慧,酿造出千古字德。其中,具有强烈个性的对称字,成为世界文字中独特的亮点。而汉字的反向性发展,更使汉字具有活力美与执着美。活力美给予汉字旺盛的繁衍力,成就了汉字的丰富性,壮大了字群的阵容;执着美,给了汉字持久的逆向力与固化力。形体美与灵魂美,活力美与执着美,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汉字的骨骼、品格与性能,支持着汉字家族的繁殖。它们的有机结合,不但组成了汉字的基因,而且衍生成华夏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密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汉字反向性的研究,是国学不可忽略的重要财富。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⑧ 汤余惠:《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第 3 页、第 23、177 页、第 77-78、401-403 页、第 1170-1175、1194-1196 页、第 706-708、1130-1134 页。

② 沈康年:《古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⑨⑩ [德]海拉·哈尔门(Harald Haarmann):《文字的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 der Schrift*),方奕译,台湾晨星事业群 1998 年版,第 12、22-25 页、第 120-122 页。

⑪ 上世纪七十年代,多瑙河谷古文字的发现因为是前苏联考古家的成果,受到西方的冷落。而后苏

联政权解体,考古一度搁置。上世纪末,相关的文物在欧美多地展出,重新吸引了西方学者的目光。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海拉·哈尔门先后在《欧洲早期文明与文字识读——文字在地中海世界的文化连续性探论》(*Early Civilization and Literacy in Europe: An Inquiry into Cultural Continuity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方奕译,台湾晨星事业群 1995 年版)、《文字的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 der Schrift*)(方奕译,台湾晨星事业群 1998 年版)等著作中,都阐述了七千年前多瑙河谷的古文明。

(陈藩庚,男,1946 年 3 月出生,籍贯福建省福清市,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学院教授,已退休。研究方向为国际华文文学、汉语及反向思维。)